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康有为、梁启超

教 育 名 著 导 读

—— 王凌皓 主编

于 静 高海水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 I A O Y U M I N G Z H U D A O D U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康有为、梁启超教育名著导读

主编 王凌皓
编著 于静 高海水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有为、梁启超教育名著导读 / 于静, 高海水编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6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 王凌皓主编)
ISBN 978-7-5472-3060-2

I. ①康… II. ①于… ②高… III. ①康有为 (1858~1927)
— 教育思想—研究 ②梁启超 (1873~1929) —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8359

康有为、梁启超教育名著导读

KANGYOUWEI LIANGQICHAO JIAOYUMINGZHU DAODU

主编/王凌皓

编著/于静 高海水

责任编辑/康迈伦

封面设计/李岩冰 李宝印

印装/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180千字

印张/14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3060-2

定价/42.00元

目 录

康有为教育名著导读	1
一 康有为的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3
二 教育名著之一《大同书》	13
三 教育名著之二《公车上书》	41
四 教育名著之三《长兴学记》	53
五 奏折篇	87
梁启超教育名著导读	113
一 梁启超的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115
二 教育名著之一《学校总论》	131
三 教育名著之二《论科举》	141
四 教育名著之三《论师范》	151
五 教育名著之四《论女学》	159
六 教育名著之五《论幼学》	173
七 教育名著之六《教育政策私议》	185
八 教育名著之七《教育当定宗旨》	193
九 教育名著之八《新民说》	203

康有为教育名著导读

以发动戊戌变法闻名于世的康有为，毕生都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思考。他不仅是改良主义政治家和保皇派首领，还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改革政治，变法图强，把教育改革作为实现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他承认和肯定功利主义、自然人性论和天赋人权，进而大力提倡人的解放，并且勇敢地进行了社会实践。他终生都在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尽管他的一些教育思想在当时未能实现，然而，这种探索和改革现实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它集中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愿望。

一 康有为的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天游化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北的银塘乡(又名苏村)敦仁里,故人又称“南海先生”。他是19世纪中国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领导者,我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他毕生都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思考,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改革政治,变法图强,把教育改革作为实现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集学者、官僚和地主三位一体的家庭,家族中既有读书为士的传统,又有从军得官的风尚。据考证,“康氏自始祖康建元繁衍至康有为凡21世;自九世祖康惟卿始为士人,流泽至康有为,凡为士人13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康家的男子走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从军起家,一条是科举致仕”^[1]。在康有为的父辈、同辈中皆有“功成名就”之例: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由于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官至广西布政使,升护理巡抚;康国器之子康熊飞,跟随其父镇压太平天国,“累功”至浙江候补道,赏“巴图鲁”;另一位叔祖康懿修,在咸丰年间办理团练,镇压当地农民起义,盘踞乡间;康懿修之子康达腾和康有为叔父康达迁,则跟随冯子材在越南抵抗法

[1]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1.

国侵略军；就连其父亲康达初，也曾在清军中佐幕，参加镇压太平军，得官提举銜江西补用知县。因此无论是从军起家还是科举致仕，都给童年的康有为以深刻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聪颖，酷爱读书，受祖辈父辈的耳提面命，少年时代便有志于圣贤之学，言必称“圣人”。6岁时他开始跟从启蒙老师番禺学者简凤仪攻读《大学》《中庸》《论语》朱注《孝经》等儒家经籍，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浸染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在祖父、朱次琦、张鼎华的先后引导下，康有为深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强烈向往经世致用。少年时代的康有为个性鲜明，好思，自信，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十一龄能文，十二览传记”^[1]，被乡邻誉为“神童”。但由于他厌弃八股制艺，喜好纵横之文，因而两次参加童子试都名落孙山。由于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富饶的平原，因此，此地较早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明的熏染，形成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康有为自17岁便“居乡，好为纵横之文。始见《瀛环志略》以及地球图等图书，初步了解国际形势”^[2]，也读到了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西方书籍。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获得的外国历史地理知识虽然有限，但是却让康有为茅塞顿开，使他从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名胜风俗，明白了地球的生成与运转道理，着实开阔了视野。

进入青年期，康有为遇上了对他一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他的国学导师朱次琦（其祖父康赞修的好友、其父康达初的老师），岭南著名的硕学通儒，晚清汉宋调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政治启蒙导师张鼎华。1876年，19岁的康有为到南海九江礼山草堂拜在朱次琦门下，攻读儒家经典、史学，掌故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和传统学术功底。与此同时，也接受“专尚践

[1] 康有为.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128.

[2] 陈永正.康有为诗文集·康有为年表简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619.

履，兼讲世事”的实学，深受朱次琦的“经世致用”治学思想的影响。另外，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综合研读各种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走出“澹如楼”，举起了启蒙的旗帜。面对国家危难和现实的刺激，他的思考触角和视野大为扩展，逐渐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理智地认识到旧学无法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因而他时常为求道无着而矛盾和苦闷。1878年，康有为辞别朱次琦，入西樵山白云洞读书，结识了前来游山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康张之间过从甚密，康有为经常去广州向张鼎华请教时事政治，二人“相得至深”。在张鼎华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1]，从此，康有为舍弃帖括、考据之学，“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2]，把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阅读各国治国、经世的著作；他阅览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社会及西学的著作，并开始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眼界更为开阔。

1879年底，康有为初游香港，亲眼目睹“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3]。香港之行，使康有为对英国殖民政府“有法度”的近代“治国”方法深有感触，开始改变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传统观念，他认识到不能再“以古旧之夷狄”的传统观念看待中西关系。从此，他开始关注“西学”，研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地理和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在逐渐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同时，他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进而把求道的希望移向西学，萌生了改变现状的革命思想，开始探究西方国家的进步原因，踏上了对人生和真理的探索 and 追求之路。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由传统的封建文化转向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般知识分子的特点。

[1] 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114.

[2] 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9.

[3] 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9—10.

1882年，康有为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南归途经上海。面对租界“十里洋场”中趾高气扬的洋人，尤其是洋人堂而皇之地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国中国”，康有为痛感丧失国家主权的耻辱。但是上海的繁盛也着实使得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神往，他更感西人“治术之有本”^[1]。怀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救国的责任感，康有为大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西书，还订了一份美国人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一并带回到南海苏村研究学习。上海之行是康有为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他对西学的认识从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层次。

康有为如饥似渴地阅读新购书籍，在认真学习西方国家的声、光、化、电等科学及各国史志和游记，掌握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后，康有为从传统文化的藩篱中走出来，自称“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2]。对比中西，康有为认识到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深深植根的传统文 化，而是将“西学”与自己已有的“中学”相糅合，逐渐构成了一套“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崭新思想体系，从而奠定了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基础。^[3]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形成了“列强环迫”的局面。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更加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国内要求变法革新的呼声越发高涨，同样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激情的康有为，也积极主张变法革新。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身份第一次向光绪帝“疾愤上书”，在这封5000字的《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中，他慷慨激昂地指出中国当时所处的危急形势：

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

[1] 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116.

[2] 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11.

[3] 李剑萍.康有为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5.

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1]

书中他还请求改良政治，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以“挽救世变”。在第一次上书中，康有为对清朝统治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断言中国完全有振兴起来的条件：“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2]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迫切的历史使命感，高举爱国和革新的旗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思想上挑战了两千多年的腐朽封建主义。但是康有为的上书遭到顽固派官僚的阻挠扣压，并未送给光绪帝御览，反而招来攻击和嘲讪。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总结失败教训，认为单纯地依靠腐败、守旧的大臣变法是没有希望的，他认识到：“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3]于是他毅然决定在广东讲学和著书，宣传他的变法维新思想，借以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长兴学舍”，自任总教授、总监督，并著有《长兴学记》为学规。随着学生逐渐增多，学舍一再易址，1893年迁至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工人文化宫），命名“万木草堂”，这里成为康有为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和酝酿、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重要场所，也成为维新教育的典范。万木草堂继承了传统书院的办学方式，在旧的办学方式之上加以新的内容，教学内容上中西兼习，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近百余人先后来此学习。康有为在这里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带领学

[1]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52—53.

[2]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1.

[3] 陆乃翔,陆敦騷.新镌康南海先生传(上编)[M].万亩草堂刊本,1929.9.

生编撰了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利用孔子“托古改制”来向顽固保守势力做斗争，以减轻“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压力，运用进化论的历史观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开始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1894年8月，康有为离开广州，于1895年初和1897年上半年曾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为指导学生学习，他撰写了指导阅读中西书籍门径的专著《桂林答问》。该书宣传孔子改制学说，并列举西学书目、读书旨趣和方法等。康有为在桂林时，除了讲学和畅游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组织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圣学会。康有为目睹外国教会势力深入中国，深为忧虑：“顷梧州通商，教士猬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1]提倡新学，开通风气，一面改革时弊，一面抵制外国的文化侵略。第二件事，创办了《广仁报》。康有为认为桂林僻远，办报可以去塞求通，了解国内外政事风俗，广开知识，以新耳目，以唤起广西人士发愤图强。第三件事，开设了广仁学堂。康有为认为教育是第一义，聚徒授业，讲中外之故，是培养维新人才的重要手段。桂林讲学为闭塞落后的广西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康有为引导学生涉猎西书，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为维新人才的培养和维新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无能，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使得群情愤慨。紧接着外国列强再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外患的不断加深激发了有识之士的爱国热情。此时，赴京会试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起领导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

[1]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68.

治”^[1]等一系列救国纲领，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二书》）。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政治的舞台，维新思想随之迅速传播。

“公车上书”后，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就职，仍继续进行变法活动。康有为又写成第三书、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光绪帝下令宣布变法，实施新政。上书中屡遭阻挠和挫折，康有为深感上层统治集团中守旧势力的强大，他认识到变法必须得到统治阶级上层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必须打开他们的眼界，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着手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作为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的据点和喉舌。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刊（后改名《中外纪闻》），借以开通朝中官僚士大夫的思想。又着手与文廷式、陈炽等人筹建带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企图团结一部分要求变法图强的社会上层势力，壮大变法维新运动的力量。次年，强学会被封，康有为回到万木草堂继续讲学，撰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陈“四邻交逼，不能立国”，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敦促光绪帝痛下变法决心。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旋又离港赴日。他坚持改良主张，幻想日本和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在拒绝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合作的要求后，他于1899年7月组织了保皇会，此后奔波于日本、加拿大、中国香港、英国之间，在政要及华侨中展开保皇与救上的宣传活动。

[1]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6.

康有为自喻是遍尝百草的神农，考求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自觉担负起寻求救国药方的重任。他四游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七游法国，八入英国，十一次至德国，对欧美先进文明“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1]。游历期间他开列出“神方大药”——《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等著作，要求迅速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国外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与时俱进，仍然坚持改良主义，组织保皇会，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革命。

1913年康有为回国，在目睹军阀割据、政治腐败、民生艰难、教化陵夷的混乱现状后，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袁世凯政权的腐败本质和卖国倾向，以及军阀割据混战给社会和民众造成的灾难；与此同时，又对袁世凯政府寄予一定的期望，并向其进言，撰写了《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中国还魂论》《乱后罪言》等文章，认为是欧美人的自由平等革命共和民主之说造成了今日中国之大乱，要保全中国，必须先保存和导扬国魂（所谓的国魂，集中体现在孔教中）。1913年底，他授意门人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孔教会，大造尊孔复古舆论，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康有为在这个时期成为“复辟的祖师”，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逆流。

1917年，张勋北上拥戴清废帝复辟，康有为积极出谋划策，并亲赴北京助阵。复辟被粉碎，康有为并未醒悟悔改，而是继续坚持复辟清王朝的决心，将戊戌以来反对民主共和、宣传君主立宪的政论汇编成《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出版，自称他的主张能挽救中国。

康有为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漫游全国各地，随处发表政论演说，于1918年在江苏金坛县创办了“述农公司”，尝试经营资本主义农场。1926年，在上海

[1]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七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44.

开办了一所天游学院，亲自为学生讲授《诸天讲》等书。

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病故于青岛福山路寓所，享年70岁。康有为谢世后，友人将其葬于青岛李村象耳山墓地，碑刻“南海康先生墓”。

二 教育名著之一《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代表作之一，是其作为现实社会改革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结晶。该书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和描绘，具有浓厚的世界意识和近代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智慧和人类的崇高理想。《大同书》中对未来社会做了细致勾画，其中涉及很多有关教育的问题，再一次向我们呈现了发达的教育不仅是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通往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大同书》的成书渊源

1. “大同”一词的由来

“大同”一词最早源自儒家经典典籍《礼记·礼运》，寄托了中国古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礼记·礼运》记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

《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文字虽然简约，但是对孙中山、康有为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胡平生，陈美兰译注. 礼记·礼运[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10.